

古典文史基本知识丛书

骈文与散文

蒋伯潜
蒋祖怡



古典文史基本知识丛书

骈文与散文

蒋伯潜 蒋祖怡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责任编辑:徐力励

* 古典文史基本知识丛书 *

骈文与散文

蒋伯潜 蒋祖怡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上海福州路 42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展望印刷厂印刷	1997 年 5 月第一版 1998 年 1 月第二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125 字数: 151 千 印数: 5001-11000
ISBN 7-80622-219-7 / I · 75	定价: 12.00 元

前 言

我国的传统文化，其包容的内含可以很广，凡过去存在过的事物，衣食住行，几乎无不可纳入文化这个范围。但传统文化就其最基本的典籍来说，集中在经、史、子、集四大部类，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十三经（或四书五经）、二十四史、诸子百家以及诗词、歌赋、散文等几大方面，这些可统称之为传统文化的“经典”。作为一个有相当文化素养的中国人，有必要也有义务尽可能多地阅读学习一些文化经典著作，以了解、通晓传统文化的源流嬗变，这样才能进一步谈继承与发扬的问题。所以，经典著作的通俗化、普及化工作，便显得十分重要。

“五四”以来，有许多著名学者在这方面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像章太炎的《国学讲演录》、顾颉刚的《尚书》翻译和《汉代学术史略》、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范文澜的《经学概论》，还有他的一些关于经学的讲演录和《文心雕龙注》等，都是杰出的成绩。这些学者中影响更为广泛的，则是朱自清、周予同和蒋伯潜。朱自清的《经论》、周予同注释的《经学历史》和蒋伯潜的《十三经概论》，都已成为学习传统文化经典的必不可少的入门书。这三部书，解放后分别由三联、中华和上

海古籍出版社重印出版，并多次加印，传播很广。但后二部书专谈经学，前一部书叙述虽很全面，却稍见简略。现在，上海书店出版社决定重印蒋伯潜、蒋祖怡父子合著的原世界书局于1942年出版的“国文自学辅导丛书”中的六个分册，正可弥补这一缺陷，适应当前读者的需要，我以为这对于传统文化的普及来说，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这六本书分别是《经与经学》、《诸子与理学》、《骈文与散文》、《诗》、《词曲》、《小说与戏剧》。据我看来，这六本书有如下几个显著的特点：

第一，文字通俗，深入浅出。作者把艰深复杂的内容，讲述得条理清晰，明白易懂，读者很容易接受。

第二，打破旧观念，建立新思想。如把不在经典之列的小说与戏剧提升到经典的位置用专册论述介绍，对白话文学也给以应有的重视等等。

第三，立论公允，不偏不倚。对学术上的今古文、汉学宋学等学派门户之争，不任意偏袒或贬低，据实论述，读者可据此得到完整的概念，并作出自己的判断。

第四，结合实际，具体实用。作者有数十年自中学至大学的教学经验，懂得学生的不同程度和具体要求，使本书的讲解切合读者的实用（如讲诗词则详述格律、音韵）。

第五，古今中外，贯穿配合。本书的论述讲解，不仅讲古，也贯穿至今；不仅讲中国的，还配合讲外国的。正如作者自序所说，本书“以文学与学术为经、文学史与学术史为纬，而文学概论、文学批评、群经诸子及理学之内容流变皆融合于其中”，可使读者对于传统文化及其渊源流变，获得切实明白的知识。

正因为如此，我以为这六本书不仅对于想在这些内容方

面有所了解的读者有帮助,而且对于普及读物的写作,也是一个很好的借鉴范例。当然,这套书也有不足的地方,就是缺少关于史书、史学及其他文史专门知识的讲解与叙述,读者可用别的书(如《中国历史研究法》、《经典常谈》等)来补充。好在本书各个分册相对独立,与整体无妨。

本书作者蒋伯潜(1892-1956),浙江富阳人。早年从钱玄同、马幼渔为师,又曾问学章太炎、梁启超门下,深研经学。三十年代末,任教于上海大夏大学、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兼任世界书局特约编审。抗战胜利后曾出任杭州师范学校校长。解放后任浙江图书馆研究部主任,并多次被选为省、市人大代表。蒋祖怡(1913-1992),毕业于无锡国学专修学校,1948年受聘于浙江大学文学院。解放后任杭州大学中文系教授、系副主任,长期从事文艺理论和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与教学。这套书的出版,也是对这二位前辈学者的纪念。

钱伯城

1996年12月,于上海

目 录

第一编 骈散文历史上的演变

第一章	骈散文的分合·····	2
第二章	汉代已有了骈散分歧的现象·····	12
第三章	魏晋文体·····	18
第四章	骈文的全盛时期——六朝·····	24
第五章	《文选》和《文心雕龙》·····	32
第六章	散文的新生·····	40
第七章	唐代骈文·····	49
第八章	“宋四六”·····	58
第九章	宋代散文·····	68
第十章	金元明的散文·····	79
第十一章	骈散文的复兴时期——清·····	87
第十二章	白话文体由酝酿而至成功·····	105

第二编 骈散文内容的分析

第一章	骈散文的异同·····	116
-----	-------------	-----

第二章	语体文和骈散文的比较	122
第三章	字的安排	129
第四章	句子的形式和变化	140
第五章	整篇的结构	149
第六章	对偶	163
第七章	关于用典	172
第八章	声音的描写与文章的音节	182
第九章	体裁的分析及其作法	193
第十章	古人论学习文章的修养	209

第一编

骈散文历史上的演变

第一章 骈散文的分合

一切文章的功用，原为传达作者的思想、情感或记述一种事物的，易言之，文章的真价值乃在记载作者的意旨，即“文以载道”是已。不过普通“文以载道”中的所谓“道”，仅是道学家心目中的圣人之道，是一种狭义的诠释，若依今日文章用途的广泛来说，“道”的范围应该加以无限的扩充，不论其为论理、记事、抒情抑或写景的文章，其所包含着的理、事、情、景均为这篇文章中所欲说明的“道”，而这些“道”便依赖了这篇文章而得流传下来。故而，在宣示这个“道”的时候，如何使得读者对于我所说的话引起共鸣的作用，那便成为写文章时值得考虑的一个问题。

人们爱美的心理基于天性，因之，要别人来相信自己的话，来规劝、教化，或直抒己感，或实言其事，其主要因素必须具有动人的美感。《汉书·扬雄传》说：“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也，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巨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正。”便是以为文章必需藻饰的一种见解。老子也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在性质上说起来，实用文与美文确乎各有其特色的，然而需要一篇文章趋于实用，也不能忽略了辞

采的美丽。

因此，所谓文章的“文”，其本义实有文采之意。刘熙《释名》说：“文者，会集众彩以成锦绣，会集众字以成辞义，如文绣然也。”梁元帝《金楼子》说：“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可见文章需要美观和有韵致，以及足以动人的情采，才能达到文章所欲发挥的力量。

文体之中，有“文”的本义的，只有后世的骈文，它有着排比藻饰的字句、叶协宫商的声调，而散文虽以单行的文辞，有随意发挥的自由，但它也着重于声调的抑扬和文字的情采的，不过不及骈文那么专重罢了。

原始的文章着重于意见的表达，随手为文，都是奇偶互用，刚柔相济，而尤注重于用韵，使得容易记诵，便得流传。清阮元的《文言说》对于这点有很精辟的议论，他说：

许氏《说文》：“直言曰言，论难曰语。”《左传》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此何也？古人以简策传事者少，以口舌传事者多；以目治事者少，以口耳治事者多。故同为一言，转相告语，必有愆误，是必寡其词、协其音以文其言，使人易于记诵，无能增改，且无方言俗语杂于其间，始能达意，始能行远。

当时印刷术尚未发明，传事必有待于记诵，所以在文化程度未高的时候，文章非如此不能发生效力。《高士传》所记帝尧之辞“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又《路史》所载舜之歌“八风回回，凤皇喈喈”，均是韵文。虽则这两首诗未必可靠，但是韵文的作品早于散体，已为必然的事实。

我们从古籍之中去观察文章的骈体、散体的形态，可知他们的渊源是很遥远的。在经书方面，阮元《文言说》谓：“《文

言》数百字，几于句句用韵，孔子于此发明乾坤之蕴，诠释四德之名，几费修词之意，冀达意外之言，要使远近易诵，古今易传，公卿学士皆能记诵，以通天地万物，以警国家身心。不但多用韵，抑且多用偶。”是《易经》中早有骈体文了。包世臣《文谱》说：

讨论体势，奇偶为先，凝重多出于偶，流美多出于奇，虽骈必有奇以振其气，虽散必有偶以植其骨，仪厥错综，致为微妙。《尚书》“钦明文思”，一字为偶；“安安”，叠字为偶；“允恭克让”，二字为偶，偶势变而生三，奇意行而若一。“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语奇也而意偶，“克明俊德”四字一句奇，“以亲九族”十六字四句偶，“协和万邦”十字三句奇，而“万邦”与“九族”、“百姓”语偶，“时雍”与“黎民于变”意偶，是奇也而偶寓焉。“乃命羲和”节奇，若夫授时，隔句为偶，中六字纲目为偶，“分命”、“申命”四节全偶而辞悉奇。“帝曰咨”节奇，“期三百”十七字参差为偶，“允厘”八字颠倒为偶而意皆奇。故双意必偶，“钦明”、“允恭”等句是也；单意可奇可偶，“光被”、“允厘”等句是也。

可见得上古文字兼有奇偶的美趣，并无骈散的歧视。《诗经》中的《诗序》，论者也以为兼骈散二体，阮元《文韵说》：“子夏此序（系指《诗序》而言）《文选》选之，亦因其中有抑扬咏叹之声音，且多偶句也。”《左传》全是散文，其中“天而既厌周德矣，吾其能与许争乎”两句也是骈偶之文。《礼记》中《礼运》、《儒行》、《哀公问》、《仲尼燕居》等篇，陈沆《东塾读书记》以为“敷演润色，骈偶用韵而成篇”，则《礼记》里也有骈体文了。至于子书一类，原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因为求写作上的便利起见，多用散体，以资发挥，但是骈丝偏片也往往而有。

例如,《道德经》“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便是偶文;《荀子》“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循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也属俚辞;《管子》“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也是骈句;又如《韩非子》“试之官职,课其功伐”,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从此可知,当时的文体,乃是骈散合辙的时期,举凡记载、叙述、议论在在均为振笔直录,全视文章内语气的需要而不拘拘于文体。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篇以为各种文体大备于战国,其实战国之文也可说是后世散文的始祖。他说:

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即《文选》诸体以征战国之賅备,京、都诸赋,苏、张纵横六国,侈陈形势之遗也。《上林》、《羽猎》,安陵之从田,龙阳之同钓也。《客难》、《解嘲》,屈原之《渔父》、《卜居》,庄周之惠施问难也。韩非《储说》,比事征偶,连珠之所肇也,而或以为始于傅毅之徒,非其质矣。孟子问齐王之大欲,历举轻暖肥甘,声音采色,《七林》之所启也,而或以为创之枚乘,忘其祖矣。邹阳辩谤于梁王,江淹陈辞于建平,苏秦之自解忠信而获罪也。《过秦》、《王命》、《六代》、《辨亡》诸论,抑扬往复,诗人讽谕之旨,孟、荀所以称述先王,傲时君也。淮南宾客,梁苑辞人,原、尝、申、陵之盛举也。东方、司马侍从于西京,徐、陈、应、刘征逐于邺下,谈天、雕龙之奇观也。

但是战国、两汉时的骚体与赋体,已是骈散文分合的先声了。《离骚》正是吾国文学中最奇特的产物,它不但上承三百篇《诗》的余绪,以超然的姿态表现其自己的面目,而且就文学的史的眼光看来,它还予后来各种文体以不同的影响。孙松友以为“屈子之词,其殆诗之流,赋之祖,古文之极致,俚体之先

声”，便很显明地说明了它予后世影响之大。

汉代文章中直接受到《骚》的影响的，便是赋。以文体的范围而言，赋仅属整朵骈文之花中的一瓣。但依今日一般人对于赋的见解，乃以为它有着独立的地位，而为过渡到所谓“骈四俪六”的骈文的桥梁。刘勰《文心雕龙》中说：“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者也。于是荀况《礼》、《智》，宋玉《风》、《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即说明它是承上启下很关重要的一大关键，也是后来骈文的滥觞。《四六丛话·叙赋》篇：“两汉以来，斯道为盛，承学之士，专精于此。赋一物则究此物之情状，论一都则包一朝之沿革，辍翰传诵，勒成一子。藩溷安笔砚，梦寐刳肠胃，一日而高纸价，居然而验风土，不洵可贵欤？左、陆以下，渐趋整炼；齐、梁而降，遂事妍华，古赋一变而为骈赋。”他又在《叙骚》篇里说：

《幽通》（班固作）、《思玄》（张衡作）宗经述圣，《离骚》之本义也；《甘泉》（扬雄作）、《藉田》（潘岳作）齐肃典雅，《东皇》、《司命》（《九歌》之一）之丽则也；《长门》（司马相如作）、《洛神》（曹植作）哀怨婉转，《湘君》（《湘》夫人）（《九歌》之一）之缥缈也；《感旧》、《叹逝》（陆机作）悲凉幽秀，《山鬼》（《九歌》之一）之奇幻也；《马汧督谏》（潘岳作）、《祭古冢文》（谢灵运作）激昂痛切，《国殇》、《招魂》（《九歌》之一）之若调也；《西征》（潘岳作）、《北征》（班彪作）叙事记游，发挥景物，《涉江》（《九章》之一）、《远游》（《楚辞》之一）之殊致也；《鸚鸟》（贾谊作）、《鸚鵡》（祢衡作）旷放沉挚，《怀沙》（《九章》之一）之遗响也；《哀江南赋》（庾信作）有《黍离》、麦秀之悲，《哀郢》（《九歌》之一）之赓载也；《小园》、《枯树》（庾信作）体物浏亮，《橘颂》

(《九章》之一)之亚匹也;《恨》、《别》两赋(江淹作)哀音惨怛,《招魂》、《大招》(《楚辞》之二篇)之神理也;《经通天表》(沈炯作)、《追答刘沼书》(刘峻作)、《辨命》、《劳生》诸论,托喻非常,《天问》(《楚辞》之一)之诡激也;《七发》(枚乘作)观涛,浩瀚清壮,《九辩》(《楚辞》之一)之体势也;《东方像赞》(夏侯湛作)、《归去来辞》(陶潜作)潇洒风流,《卜居》(《楚辞》之一)之别情也;《解嘲》(东方朔作)、《答宾戏》(班固作)问对雄奇,《渔父》(《楚辞》之一)之深趣也。……隋、唐而后,踵事增华,“秋水长天”之语咏乎歌章,“洞庭落木”之吟沿乎燕、许,要而论之,四杰富其才,右丞(王维)高其韵,柳州(柳宗元)咀其华,义山(李商隐)体其润。

他完全以具体的例证来解释这问题。刘孟涂《与王子卿太守论骈体书》中所说的话,详述其演变之迹,可以作为这一说的补充,他说:“爰自周末,以迄汉初,风降为《骚》,经变成子。建安古诗,实四始之耳孙;左(丘明)、马(司马迁)雄文,乃诸家之心祖。于是枚乘抽其绪,邹阳列其绮,相如聘其譬,子云(扬雄)助其波,气则孤行,辞多比合,发古情于腴色,附壮采于清标,骈基肇基,已兆其盛。东京宏丽,渐骋珠玑;南阳轻艳,兼富花月。家珍匹锦,人宝寸金,奋铍镗以竞声,积云霞而织色。因妍逞媚,嘘吸为芳,名流各尽其长,偶体于焉大备。”《芥隐笔记》说:“司马长卿《大人赋》,全用屈子《远游》中语。”而《复斋漫录》则说:“豫章有南浦亭,前辈赋咏,多以江淹《别赋》‘送君南浦,伤如之何’为始。余观《楚辞》云‘予交手兮东川,送美人兮南浦’,乃知江淹取此也。”更为清楚地把骈文从赋那里蜕变出来,乃间接得之于《离骚》的关系,说尽无遗。

《离骚》和赋均为一种辞采华丽的，它和骈文的关系既如上述，而它与散文的关系之密切，竟完全与骈文相同。散文名家韩愈也曾深切研究过《离骚》，所以才能产生出不少奇瑰瑰玮的文章来，《邵氏闻见后录》说：“《楚辞》文章，屈原一人耳，宋玉亲见之尚不得其仿佛，况其下者乎？惟退之《罗池庙碑》可以方驾以出。”他不但在声调、格律、意境诸方面效法《离骚》之处甚多，即以修辞的方法来说也是远祖《离骚》的。《梦溪笔谈》说：“韩退之集中《罗池庙碑铭》有‘春与猿吟兮秋与鹤飞’，今验石刻，乃‘春与猿吟兮秋鹤与飞’。古人多用此格，如《楚辞》‘吉日兮良辰’，又‘薰肴烝兮兰藉，奠桂酒兮椒浆’，盖欲相错成文则语势矫健耳。”其余著作如《闵己赋》、《别知赋》、《谈风赋》、《吊田横》、《琴操》等，均为晁无咎选入《续离骚》中，可见昌黎对于《骚》赋有甚深的修养。又如柳宗元也是有名的散文家，也同样地深通《骚》学。《寓问》说：“柳子厚作楚辞，卓诡谲怪，韩退之不能及。”《沧浪诗话》则谓：“唐人惟柳子厚深得《骚》学，退之、李观皆所不及。”林琴南《畏庐论文》：“柳州《解崇》、《惩咎》、《闵生》、《梦归》、《囚山》诸赋则直步《九章》，而《宥蝮蛇》、《斩曲几》、《憎王孙》则又与《卜居》、《渔父》同工而异曲。”都可以证明《离骚》与散文不是不相关涉的，相反地却与散文很有关系，所以《野客丛书》所称赏的王安石《题舒州山谷寺石牛洞泉穴》一篇妙文，也为晁氏所选的《续离骚》编入，凡此种种，在在均足证明散文也源于《离骚》。洪迈《容斋随笔》说：

枚乘作《七发》，创意造端，丽旨腴词，上薄《骚》些，盖文章领袖，故为可喜。其后继之者，如傅毅《七激》、张衡《七辩》、崔駰《七依》、马融《七广》、曹植《七启》、王粲《七

释》、张协《七命》之类，规仿太切，了无新意。傅玄又集之以为《七林》，使人读未终篇，往往弃诸几格。柳子厚《晋问》乃用其体，而超然别立新机杼，激越清壮，汉、晋之间诸文士之弊，于是一洗矣。东方朔《答客难》自是文中杰出，扬雄拟之为《解嘲》，尚有驰骋自得之妙。至于崔骃《达旨》、班固《宾戏》、张衡《应闲》，皆屋下架屋，章摹句写，其病与《七林》同。及韩退之《进学解》出，于是一洗矣。

又说：“韩文公《送穷文》、柳子厚《乞巧文》皆拟扬雄《逐贫赋》，韩公《进学解》拟东方朔《答客难》，柳子厚《晋问》篇拟枚乘《七发》，《贞符》拟《剧秦美新》，黄鲁直《跋奚移文》拟王子渊《僮约》，皆极文章之妙。”是后世的散文不但出于《骚》，而且又有关于赋了。

推原《离骚》所以能给予后世文章有如此的影响，乃由其内容广博所致，扼要言之，不外乎情文的深茂而已。《四六丛话序》认为散文与骈文系同出于一源，便是依据了这点意思而立论的。

骈散文在战国的时候尚在浑然的境界，及至两汉已有分歧的迹象可寻，不过尚不十分显明，直至三国之末、魏晋之际，关于“文笔”之说盛行，骈散之分遂显。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文患其事尽于形，情急于藻，义牵其旨，韵移其意，……手笔差易，文不拘韵故也。”《晋书·蔡谟传》：“文笔议论，有集行于世。”然而，却还未曾有确切的判明。《南史·颜延之传》：“宋文帝问延之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笔，测得臣文。’”梁元帝《金楼子》：“屈原、枚乘、长卿之徒止于辞赋，则谓之‘文’；善为章奏如柏松，若此之流泛谓之‘笔’。”刘勰《文心雕龙·总